

为我国埃及学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于跃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标志着一门以考古学和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创立,时至今日,埃及学正好走过了两百个年头。相较于西方埃及学,中国的埃及学起步较晚。自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史研究所成立以来,中国开始培养出了一批具备象形文字释读能力的埃及学者。由于翻译和整理象形文字文献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国内埃及学者都曾对象形文字文献进行过翻译和注释,但大多为单篇文献的整理研究而未能成集,或有编辑成集的文献集,但大部分没有对象形文字进行转写。因此到了中国埃及学发展已近四十年的今天,中国学界需要一套由中国人转录自原始文献,并对其进行归类、翻译和注释的文献集。

2015年由郭彤彤教授译注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包括王室铭、自传体铭文、科技文献、故事等类型的文献97篇,但仍留有遗憾,这就是埃及学纷繁复杂的行政文献并未收录。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郭彤彤教授以《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这一课题申请获立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此作为其中一个子课题的文献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也应运而生。

由郭彤彤主编,郭彤彤、杨燕、梁珊译注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是一套系统翻译、注解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的巨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象形文字文献转录,下编为象形文字文献的转写、翻译和注释。全书共850页,收录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也即第18、19、20王朝的经济类文献共计79篇。这套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对象形文字原文进行了精准全面的转录。由于大部分象形文字文献的底本都是用行文书写但字迹潦草的祭司体埃及语书写的,因此对于这类文献的整理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转写为易于辨认释读的铭刻体埃及语文献。而经济类文献,由于其包含着大量的字迹潦草的数字和日期的记录,而在转写成铭刻体埃及语时更是困难重重。但对其收集整理却十分必要,这些数字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量化研究,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研究古埃及的国家体制、社会分层、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除了经济文献中的数字书写潦草外,这些数据本身也难以理解,因为虽然埃及人有着享誉古代世界的数学知识体系,但他们对数字,尤其分数的运用并不细致。为此,埃及学界现行相关转录版本没有将过于潦草的数据全部转写出来,这就导致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出现歧义,甚至错误。基于此,本书下大功夫将祭司体原文中的几乎所有数据全部准确地转录成铭刻体,并附有彩印图片以便读者查阅,为学者对古代埃及经济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文献资料。

本书选录的篇幅最长的韦伯纸草是一篇记录了土地清算数量以及每年收成的文献,其祭司体原文不乏分数和计量单位书写欠清等问题,对此,以往转录者通常直接漏掉,译本也直接漏掉,或者对不同的计量单位不做区分,而本书不仅对其进行了全部的铭刻体转录,而且在拉丁化转写和翻译中做了详细的整理和标注,使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而都灵纸草的祭司体原文中大量的年份记录残缺不全,为此,本书根据上下文以及全文的内容,对其进行了补充,并做了详细的注释,从而增强了该文献的完整性。

第二,创立象形文字文献整理新范式。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整理上国际埃及学界并没有统一版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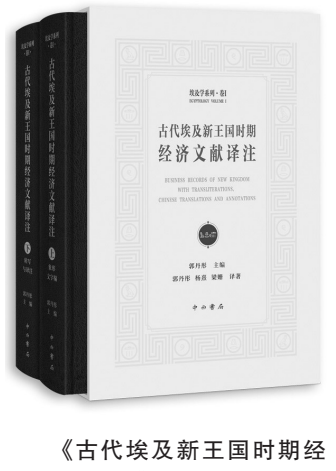
由于我国的象形文字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还不多,统一的版式也未形成。并且国内的大部分译注类著述只有中文翻译和注释,并没有对文献进行拉丁化转写,而在国外,虽然象形文字文献的整理时有拉丁化转写,但多为单篇文献,像本书这种全书79篇文献全部附有拉丁化转写的文献整理著述并不多见。拉丁化转写是象形文字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没有拉丁化转写,我们对译文是否符合埃及语语法规范,是否漏译,译文是否精准,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定。本书收录的文献不仅全部附有拉丁化转写,而且根据中文古典文献整理的范式,结合古代埃及文献本身的特点和含义,对译文进行了适度的补充,并对其中的度量单位以及人名、地名、神庙名称和土地的类型进行了标注,方便读者的理解。如此,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整理版式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规范且容易理解的范式。

第三,扩展性注释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为了便于读者对文献的理解,本书对79篇文献的译文均作了详细的注释。并且本书的注释并不只是简单的指明某一专有名词是人名、地名、官职或度量单位等,而是对这一专有名词的扩展性解读,即不仅指出这一专有名词的基本含义,而且也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阐释,从而使读者对其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本书在对韦伯纸草中出现的诸如“马夫长”等官职、“女市民”“外国人”等社会阶层、“新地”等土地类型等专有名词的注释就是典型的扩展性注释。

第四,附录索引提高了本书的实用性。为了给读者查阅文献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本书制作了索引,将书中出现的神名、国王名、人名、地名、神庙名、土地的类型、官职等所有的专有名词逐一制成索引,这在国内外古典文献整理上鲜有先例。

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基于文献资料收集的难度以及部分铭文版权问题,本书收录的部分铭文仅仅是节选,例如哈里纸草等。虽然这些节选对于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但若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作为文献资料,仅有节选是不够的,因为透过这些节选的文献,研究者无法对古代埃及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构建。其次,虽然本书将诸如韦伯纸草和都灵纸草等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重要的经济文献收录其中,但仍有一些经济文献没有收录。因此,这套文献集在“全”上还需要下功夫,建议本书作者继续收集相关文献,将它们作为本书的增补刊发。

本书作者在后记中说,整理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是她毕生的事业。事实上,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整理、翻译和注释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国埃及学界共同的事业。这套书只是我国埃及学者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整理研究的开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质量上乘的文献整理类著述问世,从而为我国埃及学的长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郭彤彤主编,郭彤彤、杨燕、梁珊译著,中西书局2021年11月第一版,980.00元

清嘉庆诗话的学术价值与时代特色

■谢安松

诗话之作,自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始。降至元明,诗话创作不绝,至清代而盛极。宋人诗话数量,郭绍虞先生考订有140种。而明代诗话,陈广宏、侯荣川二先生指出有230余种。到清代,诗话数量又远超前代之和。张寅彭、蒋寅二先生认为现存清诗话数量达1000种之多。

清诗话以其数量之巨、访书之难,而难以求全。可喜的是,张寅彭先生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的整理工作,陆续推出阶段成果。继《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清诗话全编·乾隆》之后,2021年11月,《清诗话全编·嘉庆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套书共8册340余万字,由张寅彭教授统稿定稿,姚蓉教授负责点校,体例统一,点校严谨,质量上乘。

一、《清诗话全编·嘉庆期》的文献价值

《清诗话全编·嘉庆期》的整理出版,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套书收录诗话凡61种,从吴騄《拜经楼正期》《清诗话全编·乾隆》之后,2021年11月,《清诗话全编·嘉庆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套书共8册340余万字,由张寅彭教授统稿定稿,姚蓉教授负责点校,体例统一,点校严谨,质量上乘。

《清诗话全编·嘉庆期》的整理择取善本、足本,以较早较全的刻本为主。嘉庆朝61种诗话,时间明确的刻本44种,其中嘉庆时期刻本尤多,达26种,占比超过一半。道光朝刻本8种,道光以后刻本10种。《清诗话全编·嘉庆期》还选取了8种稿抄本,弥足珍贵。如《拜经楼诗话余编》即据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点校;《兰言萃编》十二卷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点校;《梅花诗话》二十七卷据浙江省平湖市图书馆藏稿本点校。

此套书的点校工作量巨大,稍有不慎,便可能出错。比如《梅花诗话》原稿复杂,增删量大,点校尽可能多地忠实于原稿。而对于《清诗话》

《清诗话续编》《清诗话三编》已收诗话,亦重新校对其中的文字错误、断句不当与标点问题。如此次整理《南北诗话》所用底本虽与《清诗话续编》本相同,然而依然仔细作了校对,恢复了《清诗话续编》所校改的文字。力求忠实原作原貌,达到凡例提出的“下影印一等”的水准。

二、《清诗话全编·嘉庆期》提要的理论价值

除文献价值外,《清诗话全编·嘉庆期》提要还有着重要的诗学理论价值。提要往往体现出编撰者的诗学倾向,包含了对一代文学的看法与立场。张寅彭所撰提要,明确版本源流,揭示诗学属性,颇有四库提要之风范。与《清诗话全编》前几期的提要合为一体,体现出他对嘉庆朝诗学的独特思考。

张先生对于诗话创作年份、成书过程、作者生平等,在提要中往往作简要考证,颇能知人论世。如《考田诗话提要》称:“所记买墓田事构讼反复,在嘉庆十三至十七年,书当成于嘉庆末。”这便考证清楚了诗话的大致年份。而对熊士鹏《竟陵诗话》成书则加以还原,指出此书是汇辑《诗归》《史疑》《楚天樵话》等多种书而成。

张先生在提要中对于作者与重要诗学人物交往、诗学旨趣往往加以说明。这为诗话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如《南野堂笔记提要》指出:“于今人服膺袁枚,论诗主性情自然,所谓‘初念最佳’,然旨趣较袁氏为正。曾作客随园,相与出题赋诗。”对于不主袁枚的诗话,张先生亦加以指出并分析原因。如评《香石诗话》云:“论诗兼录诗,立场大底在王渔洋神韵一路……渔洋与潭溪曾先后视学广东,影响南粤诗坛甚深,此皆其遗响也。故于近人不敢吐归惠、袁子才。”

张先生在提要中还每每指出诗话的整体水准,各家区别,优点不足。如评赵翼《瓠北诗话》云:“瓠北史家兼诗人,此书又为其晚年见识,故甚可听……凡此与同时之袁随园‘性灵’说声气相应,然瓠北运其史

家之才识,持论较随园为整饬。”这便指出了史家赵翼与诗人袁枚诗学之间的异同。再如评《批本随园诗话》云:“此人学识不足道,竟不知考亭为朱子,然于《诗话》偶涉之满蒙习俗、方言俚语……等每有解释,此则亦不宜一笔抹杀也。”所评皆客观而精当。

三、嘉庆期诗话的新变

清代嘉庆时期诗话不仅承继前代,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期诗法、诗评类诗话减少,而记录性诗话增多,评述本朝诗人诗话增多。而诗话创作上多受到袁枚《随园诗话》的影响。在体式上则出现了点将录、诗史等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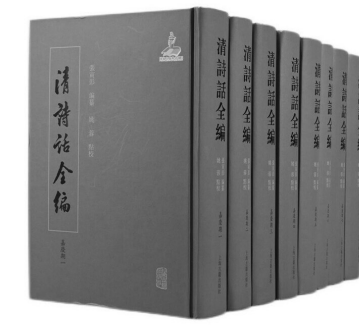
嘉庆诗话年均数量大增,大抵录诗多而论诗少。张寅彭先生《清诗话三编》序称其详细记录一代诗生活的“记录性”特点为“历史诗学”。而嘉庆以来诗话尤其明显。如袁枚作《斋诗话》自称:“是编录诗多而论诗少,不欲东施效颦,拾人牙慧。”而更有以诗话代日记者,如张日旸作《尊西诗话》,“以诗伴生话,以诗话代日记”。此期诗话篇幅上往往较大,这正突出了诗话的记录功能。如法式善《梧门诗话》达十六卷,主要搜集“边省”诗话,与袁枚《随园诗话》集中于南方并举。袁枚《斋诗话》十卷,对“蒙古、八旗、汉军、十八省”之诗无不采入。同时,类似笔记之类名称的诗话增多。如吴文瀾《南野堂笔记》、阮元《定香亭笔谈》、郭麐《鬘余丛话》、李兆元《十二笔劄杂录》等。从“笔记”“笔谈”“杂录”等便可以看出诗话记录性增强的新趋势。

嘉庆诗话对本朝诗人,尤其是同时代诗人的评述大为增加。乾隆时期,杨际昌《国朝诗话》即是对本朝诗人的专门评述。到嘉庆时期,类似诗话则全面生发。如袁枚创作《斋诗话》,“所采皆近人之句”。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更是对乾隆、嘉庆时期诗人进行点评。

嘉庆诗话创作上多受《随园诗话》影响。袁枚《随园诗话》在嘉庆年间影响甚巨,很多文人为其删订、批注或仿写。如《斋诗话》作者袁洁“嫌《随园诗话》太冗,曾为去其芜杂,存其精华,另成一帙”。而《批本随园诗话》,更是对《随园诗话》进行全本批注。此期受到《随园诗话》影响而创作的诗话亦多。如法式善《梧门诗话》,更是对《随园诗话》“虽冤考极博,而地限南北”而作。吴任臣作《兰言萃编》,“搜访友人佳句逸事不遗余力,一如《随园诗话》”。

嘉庆时期诗话在体式上的新变,突出体现在“点将录”与史著体式诗话的出现。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模仿《东林点将录》,对乾嘉时期一百四十余位诗人排定座次,为一全新的形式。其后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盖受其影响。而张斌所著《梅花诗话》,汇采历代咏梅之作,俨然一部梅花史。

总而言之,《清诗话全编·嘉庆期》不管在诗学文献整理,还是在提要写作上,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套书是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它的出版,必将推动清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



《清诗话全编·嘉庆期》(全八册),张寅彭主编,姚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1280.00元

批注或仿写。如《斋诗话》作者袁洁“嫌《随园诗话》太冗,曾为去其芜杂,存其精华,另成一帙”。而《批本随园诗话》,更是对《随园诗话》进行全本批注。此期受到《随园诗话》影响而创作的诗话亦多。如法式善《梧门诗话》,更是对《随园诗话》“虽冤考极博,而地限南北”而作。吴任臣作《兰言萃编》,“搜访友人佳句逸事不遗余力,一如《随园诗话》”。

嘉庆时期诗话在体式上的新变,突出体现在“点将录”与史著体式诗话的出现。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模仿《东林点将录》,对乾嘉时期一百四十余位诗人排定座次,为一全新的形式。其后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盖受其影响。而张斌所著《梅花诗话》,汇采历代咏梅之作,俨然一部梅花史。

总而言之,《清诗话全编·嘉庆期》不管在诗学文献整理,还是在提要写作上,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套书是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它的出版,必将推动清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

总而言之,《清诗话全编·嘉庆期》不管在诗学文献整理,还是在提要写作上,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套书是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它的出版,必将推动清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

品书读人

探究林散之和他的时代

■冯伟

给当代草圣林散之作传,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性的叙事。此书是众多“林散之传”中唯一的“评传”,“评”的性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因此,在讨论《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一书之前,需要谈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

本书作者路东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不拘一格的读者和思考者。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命运”一词,而在在我看来,路东为林散之作传,似乎更有命运的安排。林散之生于乌江,也即当今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路东亦生长于斯。林散之时代的草木,也曾陪伴路东的成长。

林散之在诗书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甘寂寞,但又孜孜以求,虽然决定了作者之于传主的意义。因此,在讨论《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一书之前,需要谈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

本书作者路东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不拘一格的读者和思考者。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命运”一词,而在在我看来,路东为林散之作传,似乎更有命运的安排。林散之生于乌江,也即当今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路东亦生长于斯。林散之时代的草木,也曾陪伴路东的成长。

林散之在诗书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甘寂寞,但又孜孜以求,虽然决定了作者之于传主的意义。因此,在讨论《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一书之前,需要谈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

夜读笔记

《围城》第二章写方鸿渐去张小姐家相亲完毕,“告辞出门,洋车到半路,他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

方鸿渐想起的“那书名”,是张小姐书架上的《怎样去获得丈夫且守住他》(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钱定平《破围——破解钱锺书小说的古今中外》中说:“这本书名不见经传。但是,这种书在美国有很多,全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出版社’搞的。”实际是没能坐实小说中这部书。赵一凡《《围城》的讽刺与掌故》(载《读书》1991年3期)一文说:“女人以丈夫为职业”这句话颇有来历”,但也没能说出这句话的出处。

卷,重点落在学艺和生涯之变。林散之生于戊戌变法的1898年,早期见证实、后期参与了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阶段。他曾在新的文化运动大潮中坚守传统,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在艺术生涯中,林散之一直坚守诗书画创作之“古法”,以艺术家身份求索,继往开来,终成一代大宗师。评传并未流于于想象和虚构出的生活场景,而更多以一种概括和抽离的笔调,任文字在残存的文献碎片中静静地淌出主要的脉络,从而书写林散之的艺术精神。

林散之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往往勾连着整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这是路东叙事的重要支点。书中的林散之是一名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士,天分不必说,而其心无旁骛、孜孜不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实在是罕见。路东以写实的笔法将其真实面放在真实的地面,而不是附会地挂在超凡的山巅。林散之一生作诗数千,其生活中的苦闷、欣喜、坚持、迷惘、顿悟,都在诗中有所流露。在对林散之心路历程的梳理中,这些诗往往是共情和思索的起点。而在含混的地带,路东往往结合宏观

《围城》化用林语堂著作

■陈汝洁

《围城》第五章写方鸿渐一行赴三闾大学,行至鹰潭,镇上唯一像样的旅馆已经客满,只好住在一家肮脏的小店里。吃早点时,方鸿渐等人去考察小店的饭菜,“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膩的东西,请他们鉴赏,嘴里连说:‘好味道!’引得自己口水要流,生怕经过这几位客人的俾眼睛一看,肥肉会减瘦了。肉上一条蛆虫从唾涎里惊醒,载蠕载爬,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向这条蛆虫远远地尖了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伙计忙伸指头按着这嫩肥软白的东西,轻轻一捺,在肉面的尘垢上划了一条乌光油潤的痕迹,像新浇的柏油路,一壁说:‘没有什么呀!’顾尔谦火,连声质问他:‘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大家也说:‘岂有此理!’顾尔谦还唠唠叨叨地牵涉道才床板的事。这一吵吵得店主来了,肉里另有一条蛆虫也闻声探头出现。伙计再没法跟尸又闹……”

《围城》第五章写方鸿渐一行赴三闾大学,行至鹰潭,镇上唯一像样的旅馆已经客满,只好住在一家肮脏的小店里。吃早点时,方鸿渐等人去考察小店的饭菜,“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膩的东西,请他们鉴赏,嘴里连说:‘好味道!’引得自己口水要流,生怕经过这几位客人的俾眼睛一看,肥肉会减瘦了。肉上一条蛆虫从唾涎里惊醒,载蠕载爬,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向这条蛆虫远远地尖了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伙计忙伸指头按着这嫩肥软白的东西,轻轻一捺,在肉面的尘垢上划了一条乌光油潤的痕迹,像新浇的柏油路,一壁说:‘没有什么呀!’顾尔谦火,连声质问他:‘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大家也说:‘岂有此理!’顾尔谦还唠唠叨叨地牵涉道才床板的事。这一吵吵得店主来了,肉里另有一条蛆虫也闻声探头出现。伙计再没法跟尸又闹……”

《围城》中这一情节,与林语堂《中国究有臭虫否》一文的举例很相似。林氏文中写道:“为避免虫患起见,假定在某高等华人寓中的中西士女宴会上,忽有一只臭虫,明目张胆地,由雪白亮亮沙发露出。这种事情,是在各国家人家都有的,无论英美法意俄,但是我们不妨假定是中国人家,因为我们在国内,有一位善操英语的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为爱国观念所冲动,决心去坐在沙发上,碰一碰造化,或者可用屁股之力硬把这臭虫压死,不然便只好(这比较可能)为争国家体面而秘密受这臭虫的咀嚼。可是祸不单行,一只出来,又是一只,成群结队,蠕蠕而动,由是女主入面红耳赤,全场动容……”

林语堂文收在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我的话》下册,钱锺书创作《围城》时是能够看到的。两相比较,让人觉得钱锺书笔下的“蛆虫”是林语堂所写“臭虫”的仿写。